

财政转移支付与农户生计韧性： “驱动”还是“制约”^{*}

范燕丽^{1,2} 丛树海³

摘要：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难点和重点，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为平稳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在传统生计可持续框架中纳入心理资本要素构建生计韧性指标。基于该指标，本文从农户生计要素流动和生计策略多样性两个方面探讨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存在群体、空间和时间上的异质性，2014—2020年，农户生计韧性水平逐年提高，但低保户、中低收入农户、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仍较低；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但这种积累局限于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等满足基本生产生活需求的生计资本方面；财政转移支付通过农户生计要素流动和生计策略多样性两条生计活动渠道影响农户生计韧性；基层财政资金的有限性与不同财政资金惠及范围的差异使村级现金补助支出的增加反而会制约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提升。本文研究表明，平稳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致力于构建财政转移支付支持低收入群体发展的长效机制，促进财政转移支付在农户生计活动中发挥正向激励效应，同时，也要兼顾基层财政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 生计韧性 共同富裕 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8；F812.7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使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已成为中国主要的发展目标。然而，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村地区与城镇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会大大制约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这一背景下，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无疑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难点和重点。

^{*}本文研究得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财经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课题“发展韧性视角下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研究”（编号：ILFR202303）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挑战不仅体现在农民持续增收上，更体现在农民抵御外部风险与冲击时的能力上。突发事件会影响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冲击并从冲击中快速恢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韧性是可持续生计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个体或组织应对压力和冲击以及从中恢复的能力。生计韧性既包含对短期改变的应对能力，也包含应对长期冲击时的适应能力（Scoones, 1998）。本文认为，增强农户生计韧性水平与平稳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高度契合。

国内外学者对生计韧性的研究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特定群体的生计韧性水平，例如从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角度研究社区韧性水平（Berkes and Ross, 2013），从发展韧性视角探讨脆弱性群体的脱贫路径（Dou et al., 2020）等。二是构造生计韧性的理论框架，主要有以下三种构造方法：其一，将生计韧性视为一种潜在能力（Thulstrup, 2015; Quandt, 2018; Quandt et al., 2019; 李志平和吴凡夫, 2020），运用可持续生计等理论测算脆弱性群体的生计韧性水平；其二，认为生计韧性是一种特定的规范条件（Cissé and Barrett, 2018），较高的生计韧性水平意味着某些福利特征（例如收入、消费等）需超过一定的阈值标准，因此，该方法依赖于福利特征的选取和阈值的设定；其三，认为生计韧性是一种恢复均衡状态所需的成本（Brück et al., 2019），较高的生计韧性水平表明个体从外部风险与冲击中恢复的成本较低。三是探究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渠道，例如研究财政转移支付（李志平和吴凡夫, 2020）、数字技能（易法敏, 2021）、生计策略（Li et al., 2022）、精准扶贫政策和低保政策（李晗和陆迁, 2021, 2022）等对生计韧性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增强生计韧性的作用机制。

文献梳理发现：一方面，已有文献缺少对农户生计韧性的系统性研究；另一方面，尽管财政转移支付在减贫等方面的政策效应已得到广泛验证，然而，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下，财政转移支付对生计资本、生计要素、生计策略等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探索。本文利用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测算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贡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在经典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引入心理资本因素，构建一个包含金融、物质、自然、人力、社会、心理六种生计资本的生计韧性框架，据此测算并衡量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探索与平稳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政策导向契合。第二，基于构建的农户生计韧性指标，本文进一步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中的作用，同时，结合村级财政资金现状探讨村级财政支出总量及其配置模式、转移支付依赖、收支压力、自有财力等因素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第三，本文从生计要素流动、生计策略多样性两个方面探索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韧性的作用机制，为财政资金继续参与乡村振兴及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与政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生计韧性的形成

生计韧性指家庭或个体在不确定性环境中防止生计逆转的能力，生计韧性既强调被动的适应能力，也强调主动的反抗能力（易法敏, 2021）。由于对生计韧性的量化面临诸多困难，研究者通常以比较成熟的生计可持续框架为基础构造家庭或个体的生计韧性指标体系（Quandt et al., 2019; 李志平和吴

凡夫, 2020)。根据生计可持续框架, 生计水平由金融、物质、自然、人力、社会五种生计资本决定, 生计水平的高低体现了家庭或个体的生计可持续性与其生计韧性的强弱 (Erenstein et al., 2010; Quandt, 2018)。此外, 贫困心理陷阱假说认为, 贫困会使个体产生负面情感和压力, 降低个体的认知水平、意志力和自制力, 从而使低收入人群陷入“贫困陷阱” (Haushofer and Fehr, 2014; 解垚和李敏, 2022)。一方面, 低收入群体长期面临预算约束, 较低的家庭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计, 而且, 低收入群体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环境中, 易产生自卑心理或者对未来缺乏信心; 另一方面, 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水平、技能水平、身体素质相对较差, 对自身能力的怀疑、来自外部的压力等负面情绪易使其缺乏自我发展动力。在中国减贫实践中, “养懒汉”“等靠要”等自我发展动力不足的现象严重制约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范燕丽等, 2021)。由此可见, 心理资本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生计可持续框架的基本逻辑是, 在由制度、政策以及自然等因素形成的风险性环境中, 家庭持有的核心生计资本^①经过生计策略的选择以及结构和过程调整会形成某种生计结果, 该结果又反作用于生计资本结构。获得较好生计韧性结果的渠道主要有改善脆弱性环境、优化生计资本积累方式、转变结构和过程、调整生计策略等。各级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结构以及相关的政策、制度和文化是生计可持续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项政策、制度和文化对脆弱性环境、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均会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家庭生计结果。作为支持落后地区发展重要政策措施的财政转移支付, 也会通过影响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生计要素的流动和生计策略多样性, 最终影响其生计结果。

(二) 财政转移支付对生计韧性的直接与间接作用

财政转移支付是政府主动向特定群体提供支持的一种方式, 是中国政府为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所采用的重要政策措施。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直接作用以及通过农户生计要素流动和生计策略多样性所产生的间接作用两个方面, 对这两个方面的优化是形成高韧性生计结果的重要环节。

一方面, 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对促进农户生计资本积累具有重要作用。首先, 财政转移支付 (特别是带有“益贫”性质的转移支付, 例如针对低保户、五保户、特困户等脆弱性群体的补贴) 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Kim and Lambert, 2009; Caminada et al., 2012; 郭庆旺等, 2016), 减少农村低收入群体面临的预算约束, 为其增加储蓄、改善生活、购买农业机械设备、购置房屋等提供支持, 从而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金融、物质、自然等生计资本的积累。其次, 转移支付有利于农户人力资本的积累, 降低人力资本代际黏性 (范子英, 2020; Parker and Vogl, 2023)。农村低收入群体面临健康水平、医疗水平、教育水平、技能水平等方面的约束, 这些约束严重制约其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 这些群体的子代往往有更大概率面临人力资本积累困境。提高转移支付水平有利于增加农户对自身及其子代在医疗健康、技能培训、教育等方面的投入,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约束。最后, 转移支付有利于农户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积累。转移支付的发放需要农户的参与、确认

^①即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和监督，这会提高农户间以及农户与村干部间的互动。而且，作为政府主动提供支持的一种方式，转移支付能增强农户对政府干部队伍的信任度。此外，经济收入的增加可以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位于较低层次的基本的生理需求，为农户追求更高层次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提供了基础。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农户的金融、物质、自然、人力、社会、心理等生计资本的积累，从而形成高韧性的生计结果。

另一方面，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影响农户的生计要素流动和生计策略的多样性。土地与劳动力是农户赖以生存的基本生计要素，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使农户对农业的依存度下降，这为农户转出土地提供了契机（曹亚和陈浩，2010；许庆和陆钰凤，2018）。因此，转移支付在对劳动力要素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会对土地要素产生影响，对两种生计要素的影响往往同时存在，相互作用。首先，转移支付促使低效农业劳动力与土地分离。研究表明，农业补贴是推动土地流转的有效途径（吴学兵等，2021），转移支付能够以农业补贴等形式促进土地流转。在2016年开始的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前，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等农业补贴主要以农户承包地面积为基础进行发放，良种补贴在部分地区也以承包面积为依据进行发放（冷博峰等，2021）。也就是说，农户即使自身不经营土地，也能获得相应的农业补贴。有数据表明，约78%的农业补贴由土地转出户获得（黄季焜等，2011）。因此，当经营土地的机会成本较高时，农户倾向于转出土地。在“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农业补贴在土地流转双方之间分配。但是，由于农村土地供给不足以及农村土地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土地承包方往往拥有较高的市场地位。因此，发放农业补贴可以提高土地流转价格（杨青等，2022），激励农户转出土地，从而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其次，财政转移支付能够促使农户参与技能培训。一方面，财政转移支付能够为农户自愿参与技能培训提供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财政转移支付能够以学费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获证奖补等形式激励农户提高技能水平，从而有效实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土地转出与非农就业促使农户进行多样性生计策略探索，例如从农业劳动转向非农劳动，从传统种植业转向农林牧渔多样性农业经营，从雇工、打工转向个体经营等。此外，针对特定农户的财政转移支付（例如低保、赈灾款、抚恤金等）构建了底层农户抵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主体框架，在直接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既为农户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提供了缓冲（刘伟等，2014），也为农户进行多样性的生计策略选择提供了保障。

生计要素流动与生计策略多样性对脆弱性农户生计韧性的塑造主要来自增收效应和稳定效应。一方面，土地转出与劳动力的转移促使脆弱性群体能够通过打工等形式参与非农就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提高了农户的整体收入水平，从而提升其应对风险与冲击的能力；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具有不稳定性，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自然灾害、物价变动等因素均可能导致农户生计的不稳定，而农户的非农就业和兼业行为能很好地应对生计逆转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2：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激励农户转出土地和参与非农就业，从而提升生计韧性水平。

H3：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激励农户进行多样性生计策略探索，从而提升生计韧性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 CFPS 数据。为使各项生计资本指标具有一致性和完整性，本文以 2014 年、2016 年、2018 年和 2020 年的家庭层面数据为主体构建面板数据集，并与个体层面相关信息进行匹配以补充户主及家庭成员的信息。结合研究主题，本文在数据中仅保留社区性质为村委会的家庭、删除户主未成年的农户样本后，共得到 26003 户农户的信息，其中，2014 年 7911 户，占比 30.42%，2016 年 7184 户，占比 27.63%，2018 年 6425 户，占比 24.71%，2020 年 4483 户，占比 17.24%。此外，在全部的农户样本中，有 58.67% 的农户获得了政府补贴，占比超过一半。2014—2020 年，农户平均生计韧性水平为 0.3937，生计韧性水平最大值为 0.6346，最小值仅为 0.0500，二者差距较大，且最小值与样本农户的平均生计韧性水平也存在很大差距。这一结果表明，农户群体内部存在严重的生计韧性分化。由于在 CFPS 数据中，仅有 2010 年与 2014 年的数据包括村级层面信息，所以本文所使用的村级层面信息均来自 2014 年 CFPS 数据。

（二）变量选取和测量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被解释变量为生计韧性。由于生计韧性无法直接观察和测度，所以，本文借鉴 Quandt (2018) 和 Quandt et al. (2019) 提出的家庭生计韧性方法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approach, 简称 HLRA)，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测度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此外，中国的扶贫经验显示，“养懒汉”“等靠要”等自我发展动力不足的现象是制约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也证明了“扶志”在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中的重要性（解垚和李敏，2022）。心理学界更是认为，心理成长是提升个体发展韧性的关键（于肖楠和张建新，2005）。因此，本文在五类生计资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心理资本，以更全面地刻画农户的生计韧性。指标的选取和测度主要参考 Quandt et al. (2019)、Quandt (2018)、耿亚新等 (2021) 以及李志平和吴凡夫 (2020) 的研究。

农户生计韧性指标体系的具体构建方法详见表 1。

表 1 农户生计韧性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指标含义及计算方式
金融资本	低风险金融资本	0.0508	家庭现金和存款总额（元）
	高风险金融资本	0.0262	家庭股票、基金、国债等金融产品总额（元）
物质资本	房屋价值	0.0516	家庭房屋调查当年的市场总价值（万元）
	耐用消费品价值	0.0528	家庭耐用消费品（例如汽车、电脑、家电等）调查当年的市场总价值（元）
	农业机械价值	0.0466	家庭农用机械（例如拖拉机、脱粒机、机引农具、抽水机、加工机械等）调查当年的市场总价值（元）
自然资本	土地资本	0.0605	家庭是否经营集体土地（包括耕地、林场、牧场、水塘）：是=1，否=0
	水资源利用	0.0584	家庭做饭是否使用自来水、桶装水、纯净水：是=1，否=0
	能源使用	0.0575	家庭做饭是否采用煤气、液化气、天然气、电等能源，而非柴草和煤炭：是=1，否=0

表1 (续)

人力资本	劳动能力	0.0591	家庭劳动力总数，指家庭中年龄在18~55岁的人数
	文化程度	0.0595	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均值：1~8分别表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
	健康状况	0.0605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均值：1~5分别表示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非常健康
社会资本	人情礼支出	0.0565	家庭人情礼支出（元）
	邻居信任度	0.0612	家庭成员对邻居信任程度打分的均值：取值范围0~10，数值越大，表示对邻居的信任程度越高
	本地干部信任度	0.0608	家庭成员对本地干部信任程度打分的均值：取值范围0~10，数值越大，表示对本地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
	组织参与	0.0549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各级人大代表、各级政协委员、工会成员以及其他协会组织成员：是=1，否=0
心理资本	主观社会地位	0.0608	家庭成员本地社会地位自评均值：取值范围1~5，数值越大，表示本地社会地位越高
	生活满意度	0.0611	家庭成员生活满意度自评均值：取值范围1~5，数值越大，表示生活满意度越高
	未来信心	0.0612	家庭成员对未来信心程度自评均值：取值范围1~5，数值越大，表示对未来的信心程度越高

农户生计韧性是一个包含六项生计资本的综合指标，为了避免由主观确定指标权重造成的偏误，本文借鉴 Li et al. (2022) 和王军等 (2021) 的方法，运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同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还运用等权重法和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简称 PCA）合成生计韧性指标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在使用熵值法之前，需对所有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已将所有指标调整为正向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如（1）式所示：

$$nx_{ijt} = \frac{x_{ijt} - \min\{x_j\}}{\max\{x_j\} - \min\{x_j\}} \quad (1)$$

（1）式中： $i=1, 2, \dots, n$ ； $j=1, 2, \dots, m$ ； $t=1, 2, \dots, s$ ； x_{ijt} 为 t 年 i 农户第 j 项指标的值； $\min\{x_j\}$ 和 $\max\{x_j\}$ 分别表示指标 j 在所有年份与个体中的最小值与最大值； nx_{ijt} 为指标的无量纲化结果。

计算 t 年 i 农户第 j 项指标在总体指标中所占比例 sx_{ijt} ，如（2）式所示：

$$sx_{ijt} = \frac{nx_{ijt}}{\sum_{t=1}^s \sum_{i=1}^n nx_{ijt}} \quad (2)$$

接下来，以 s 表示年份，计算指标 j 的信息熵 e_j ：

$$e_j = -k \sum_{t=1}^s \sum_{i=1}^n (sx_{ijt} \times \ln sx_{ijt}) \quad (3)$$

(3) 式中, $k = \frac{1}{\ln(s)}$ 。那么, 信息熵冗余度 d_j 可表示为:

$$d_j = 1 - e_j \quad (4)$$

根据信息熵与冗余度计算指标权重 w_j , 如 (5) 式所示:

$$w_j = \frac{d_j}{\sum_{j=1}^m d_j} \quad (5)$$

因此, 农户生计韧性 res_{it} 可以表示为:

$$res_{it} = \sum_{j=1}^m (w_j \times sx_{ijt}) \quad (6)$$

res_{it} 的数值越大, 表示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越高, 在遇到外部风险冲击时抗击生计逆转的能力越强。反之, res_{it} 数值越小, 表示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越低, 抗击生计逆转的能力越弱。

2.核心解释变量和机制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转移支付。为进一步探究财政转移支付如何影响农户生计韧性, 本文进一步构造土地转出、出租土地所得、非农就业、总收入多样性、非农收入多样性、农业生计多样性等机制变量。其中, 土地转出是促进土地与劳动力等生计要素流动的重要原因。而且, 出租土地所得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农户参与土地转出的意愿。在对总收入多样性与非农

收入多样性的测度方面, 本文参照 Johnny et al. (2017) 的研究构造辛普森指数: $simpson_i = 1 - \sum_{u=1}^v p_{i,u}^2$ 。

其中, i 表示特定农户, u 表示一种收入来源, v 为农户收入来源总数, $p_{i,u}$ 表示 i 农户第 u 种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辛普森指数越大, 总收入多样性程度越高。非农收入多样性变量的构造方式与此类似。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较强, 从事农林牧渔业多样性经营可有效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由于 2014—2020 年的 CFPS 数据仅完整披露了是否从事种植业或林业, 是否从事牲畜水产养殖业的信息, 因此, 农业生计多样性变量的取值为 0~2。0 表示该农户未从事农业活动; 1 表示该农户要么从事种植业或林业, 要么从事牲畜水产养殖业; 2 表示该农户既从事种植业或林业, 又从事牲畜水产养殖业。

3.控制变量。参考李志平和吴凡夫 (2020)、宋璐和李树茁 (2017) 的研究, 并综合考虑指标的完整性与可获得性, 本文将农业生产、土地征用、家庭消费、家庭规模、风险态度作为农户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此外, 本文还控制了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由于 2014—2020 年的 CFPS 数据仅有 2014 年的数据公开了对应的村级层面信息, 控制村级层面特征会损失大量观测值, 因此, 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并未引入村级层面的控制变量。不过,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通过加入时间固定效应项和农户个体固定效应项, 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和随个体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影响, 估计结果较为可信。为排除村级层面特征对估计结果的可能影响,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

中引入人均村级财政支出、村委会与集镇的距离、村农业劳动力比例、村人均耕地面积等村级层面的控制变量进行估计，模型设定中同时控制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

表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数
生计韧性	基于表1中农户生计韧性指标体系计算的综合指标	0.3937	0.0785	26003
财政转移支付	家庭获得的各项政府补贴总额（元）	1031	4051	25744
土地转出	是否转出土地：是=1，否=0	0.1128	0.3163	26003
出租土地所得	出租土地所得的租金总额（元）	296	1674	25982
非农就业	家庭成员是否参与非农就业：是=1，否=0	0.7050	0.4560	25981
总收入多样性	家庭总收入多样性辛普森指数	0.2346	0.2183	24175
非农收入多样性	非农收入多样性辛普森指数	0.1405	0.1950	22432
农业生计多样性	农业生计种类	1.0923	0.7618	24062
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总值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41.5629	1905	25599
土地征用	土地是否被征用：是=1，否=0	0.0681	0.2519	25998
家庭消费	家庭消费性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41.2536	1627	25262
家庭规模	一起吃饭的家庭人口数（人）	3	1.7140	26002
风险态度	低风险资产（现金和存款）总额与高风险资产（股票、基金、国债等金融产品）总额的比值	28358	92373	26003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岁）	51	13.6313	25506
户主性别	户主性别：男=1，女=0	0.5650	0.4958	25506
户主受教育水平	户主已取得的最高学历：1~8分别表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	2.4510	1.4149	25394
人均村级财政支出	村级财政支出/村常住人口数（元/人）	6448	45553	369
村委会与集镇的距离	村委会到集镇的距离（千米）	7.4534	32.9888	408
村农业劳动力比例	村农业劳动力比例（%）	45.9553	26.3144	400
村人均耕地面积	村耕地面积/村常住人口数量（亩/人）	1.7257	1.8660	387
村常住人口数量	村常住人口（人）	3787	4468	609
村户籍人口数量	村户籍人口（人）	3404	3581	596

注：①财政转移支付、出租土地所得、人均村级财政支出、村委会到集镇的距离变量在表中呈现的是对原值进行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后文回归中则取对数。②由于许多农户高风险资产总额为0，因此，在计算风险态度时本文将分母（高风险资产总额）加1，以免人为造成过多的异常值。③表中的村级特征变量仅包含社区性质为村委会的村，观测值为社区性质为村委会的村的个数。④为保障估计系数的可解释性，对农业生产、家庭消费、风险态度三个变量在回归中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三）回归模型设定

为进一步探讨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基于测算所得的农户生计韧性指标，本文构

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ln res_{it} = \alpha + \beta \ln sub_{it} + \gamma controls_{it} + \mathcal{G}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7)$$

(7) 式中： $\ln res_{it}$ 表示 t 年 i 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对数值； $\ln sub_{it}$ 表示 t 年 i 农户所获得财政转移支付的对数值； β 为本文重点考察的体现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韧性影响的回归系数； $controls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农业生产、土地征用、家庭消费、家庭规模、风险态度、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水平等变量； \mathcal{G}_i 、 δ_t 分别用于控制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误差项。

在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农户生计要素流动与生计策略多样性方面，非农就业使农户出现兼业行为和多样性经营行为，这会提升农户获取生计资本的能力。在风险与不确定性环境中，较高的生计资本获取能力能有效预防自身生计的逆转。基于前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以下模型以检验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要素流动和生计策略多样性的影响：

$$mech_{it} = \alpha + \beta' \ln sub_{it} + \gamma controls_{it} + \mathcal{G}_i + \delta_t + \mu_{it} \quad (8)$$

(8) 式中： $mech_{it}$ 表示一系列机制变量，包括土地转出、出租土地所得、非农就业、总收入多样性、非农收入多样性、农业生计多样性， β' 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与各机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μ_{it} 为误差项。其余变量与 (7) 式含义相同。

四、生计韧性测算及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一) 生计韧性的测度结果分析

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存在群体异质性、空间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图 1 展示了不同分组情形下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累积分布曲线。图 1 (a) 显示，低保户生计韧性水平的累积分布曲线位于非低保户的左上方。同时，低保户的生计韧性水平均值为 0.3609，比非低保户低 8.8%。这说明，无论从整体分布还是均值看，低保户的生计韧性水平均远低于非低保户。这意味着，前者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发生生计逆转的可能性更高。由此可见，提升低保户的生计韧性水平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图 1 (b) 为按照收入从低到高四等分划分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累积分布曲线，从左至右依次为最低收入（收入位于 0~25% 区间的群体）、中低收入（收入位于 25%~50% 区间的群体）、中高收入（收入位于 50%~75% 区间的群体）、最高收入（收入位于 75%~100% 区间的群体）。可以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均值也依次增加，这说明农户抵御生计逆转的能力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图 1 (c) 为按照地区划分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累积分布曲线，可以发现，无论从整体分布还是均值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依次降低。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农户生计韧性水平低于西部地区，排名最后。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历史、产业、人口、环境等因素使东北地区的整体发展势头不足；另一方面，由于 CFPS 数据中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样本量极少，而且这些地区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较低，这可能会对西部地区的整体结果产生影响。图 1 (d) 为按照时间划分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累积分布曲线，可以发现，

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这四年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逐年提高。特别地，在2018年与2020年，农户生计韧性水平提升显著。这意味着，如果从农户生计韧性角度反观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可以认为，农村发展态势逐年向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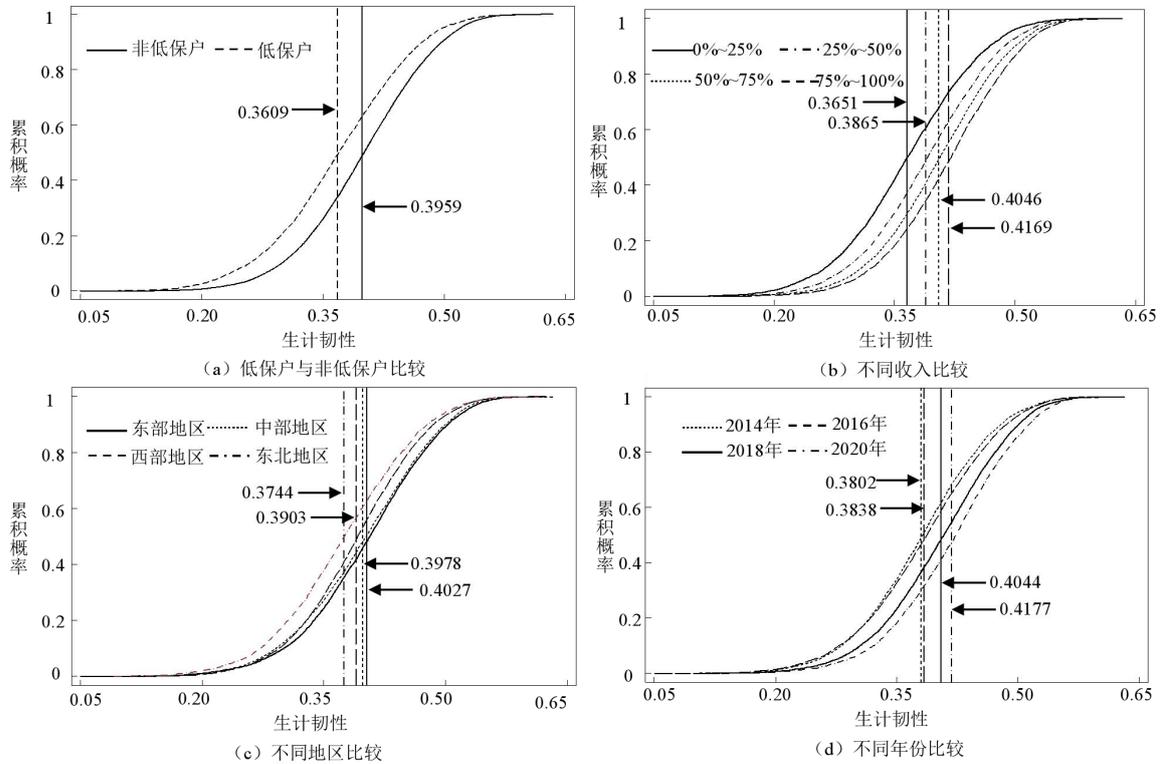


图1 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累积分布曲线

注：垂直竖线表示各分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均值，图1(c)东、中、西、东北地区参照国家统计局标准进行划分。

(二) 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韧性的作用

表3展示了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韧性影响的估计结果。(1)列为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2)列和(3)列分别表示加入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和户主层面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4)列为控制家庭和户主层面全部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以上估计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能够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而且，加入控制变量后，财政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根本变化。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与李志平和吴凡夫(2020)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说明，生计韧性指标构建方式和估计方式的差异并不会影响基本结论。

表3 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

变量	生计韧性			
	(1)	(2)	(3)	(4)
财政转移支付	0.0016*** (0.0005)	0.0014*** (0.0005)	0.0016*** (0.0005)	0.0015*** (0.0005)

表3 (续)

农业生产		0.0002 (0.0003)		0.0002 (0.0003)
土地征用		0.0079 (0.0052)		0.0060 (0.0052)
家庭消费		-0.0018 (0.0013)		-0.0017 (0.0012)
家庭规模		0.0061*** (0.0012)		0.0064*** (0.0012)
风险态度		0.0034*** (0.0008)		0.0030*** (0.0007)
户主年龄			-0.0004** (0.0002)	-0.0003 (0.0002)
户主性别			0.0010 (0.0033)	0.0012 (0.0033)
户主受教育水平			0.0105*** (0.0012)	0.0104*** (0.0013)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25748	25079	25148	24502
R ²	0.0670	0.0699	0.0744	0.0771

注：①**和***分别表示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 内生性讨论、稳健性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1. 内生性讨论。首先，通过基准回归得到的财政转移支付系数可能由于内生性问题而存在偏误。例如，可能存在同时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与农户生计韧性的不可观测的因素，生计韧性水平较低的农户更易得到财政转移支付等。因此，本文参考崔景华等（2018）的研究，选取村常住人口数量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以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村常住人口数量和单个农户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收入高度相关，村整体获得的转移支付总量有限，常住人口增加使得户均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减少，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村常住人口数量与单个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并无直接关联，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定。表 4（1）列报告了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村常住人口数量的估计系数为-0.0002，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显著，表明村常住人口数量与财政转移支付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村常住人口增加降低了户均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收入。表 4（2）列显示，在第二阶段，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0157，且仍在 1%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显著，而且，系数估计值的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此外，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的值为 216.30，满足 F 统计量高于 16.38 的阈值的条件，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此外，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在 1%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有效。中国现阶段

转移支付的测算和分配从以户籍人口数量为基础向以常住人口数量为基础转变，然而，在本文观测期的前期，村户籍人口数量依旧是转移支付测算分配的重要因素。而且，村户籍人口数量被人为操纵的可能性更小，特别是对于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其户籍变动的难度更大。因此，本文还使用村户籍人口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表4（3）列报告了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村户籍人口数量与单个农户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呈负相关关系。表4（4）列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提升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同理，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 66.28，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在 1% 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拒绝原假设，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工具变量有效。

表4 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财政转移支付		0.0157*** (0.0046)		0.0137* (0.0080)
工具变量	-0.0002*** (0.0000)		-0.0001*** (0.0000)	
家庭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户主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8113	18113	18242	18242
R ²	0.1791	0.0980	0.1720	0.1092

注：①*和***分别表示 10%和 1%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③（1）列和（2）列所用的工具变量为村常住人口数量，（3）列和（4）列所用的工具变量为村户籍人口数量。

2.稳健性检验。第一，本文运用等权重法和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算农户生计韧性水平，以排除不同权重和不同测算方法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相关结果见表5（1）列和（2）列。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依然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第二，本文所采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量包含家庭获得的各项政府补贴总额。然而，部分研究认为，养老金系统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应将养老金也看作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形式（Lindert et al., 2006）。基于此，本文构造了包含养老金在内的广义转移支付指标进行重新估计，结果见表5（3）列。结果显示，广义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为 0.0016，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第三，农业补贴是农户获取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形式，农业补贴对农业种植规模、土地流转等均会产生影响。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运用 2014 年的 CFPS 数据，构建是否获得农业补贴变量（若农户获得农业补贴，则将其赋值为 1；若农户获得其他形式的补贴，则赋值为 0），估计结果如表 5（4）列所示。结果表明，农业补贴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第四，调查样本可能存在异常值，为避免异常值对整体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 5% 的缩尾处理，结果如表 5（5）列所示。相关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第五，本文去除 4 个直辖市的农户样本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5（6）列所

示。可以发现，相关估计结果仍与基准回归一致。第六，由于村庄的整体特征可能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影响，为使估计结果更加准确，本文增加了村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村级财政支出、村委会与集镇的距离、村农业劳动力比例、村人均耕地面积），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7）列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综上所述，可以认为，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韧性存在正向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同样支持这一结论。

表5 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等权重法	(2) 主成分 分析法	(3) 广义转移 支付	(4) 农业补贴	(5) 5%缩尾	(6) 去除直辖市 市样本	(7) 增加控制 变量
财政转移支付	0.0016** (0.0005)	0.0045*** (0.0009)			0.0016*** (0.0004)	0.0014** (0.0005)	0.0012** (0.0006)
广义转移支付			0.0016*** (0.0005)				
农业补贴				0.0696*** (0.0131)			
家庭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户主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级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24430	24503	24429	4836	24500	23568	18911
R ²	0.0818	0.2202	0.0769	0.2680	0.0810	0.0771	0.0714

注：①**和***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③（2）列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生计韧性水平时剔除了独特性（uniqueness）大于0.6的二级指标，这些指标包括水资源利用（0.6421）、房屋价值（0.8134）、农业机械价值（0.7166）、组织参与（0.6155）。而且，KMO和Bartlett检验显示，p值显著（p=0.000），KMO值大于0.6（KMO=0.682），说明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经PCA降维后，共生成9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为81.91%。④本文采用的CFPS数据仅2014年披露了转移支付的具体项目及村级层面的详细数据，故（4）列仅使用2014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7）列增加的村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均为2014年的值。

3. 异质性分析。已有研究表明，财政转移支付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举措，能有效缓解社会不平等现象（解垩，2017）。那么，在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提升过程中，财政转移支付对不同收入的群体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全部农户按照收入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分别将其分成四组和两组，通过对比财政转移支付对不同收入群体生计韧性的影响，阐释财政转移支付的异质性作用。

表6（1）列的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最低收入群体（收入位于0~25%区间的群体）生计韧性水平的提升作用十分明显。（2）列的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同样会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位于25%~50%区间的群体）的生计韧性水平，但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均有所下降。（3）列和（4）

列的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中高收入群体（收入位于 50%~75%区间的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收入位于 75%~100%区间的群体）生计韧性水平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同理，（5）列和（6）列的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较低收入群体（收入位于 0~50%区间的群体）生计韧性水平的提升作用是正向的，对较高收入群体（收入位于 50%~100%区间的群体）作用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对低收入群体生计韧性水平的提升作用较大，验证了财政转移支付在缓解不平等现象中的积极作用。

表 6 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群体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5)	(6)
	0~25%	25%~50%	50%~75%	75%~100%	0~50%	50%~100%
财政转移支付	0.0101** (0.0053)	0.0103* (0.0057)	-0.0066 (0.0062)	-0.0081 (0.0056)	0.0119*** (0.0034)	-0.0012 (0.0039)
家庭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户主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4085	3498	3888	2355	7583	6243
R ²	0.1155	0.0626	0.1031	0.0450	0.1021	0.0769

注：①*、**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③为比较不同群体获得财政转移支付所产生的边际效应，表中各列回归中仅保留获得转移支付的农户样本。

生计韧性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由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社会风俗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财政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对这种异质性的分析能够为制定差异化转移支付政策提供依据。由表 7 可见，财政转移支付对增强西部地区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具有明显作用，但对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则无显著作用。这说明，需要加强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转移支付的政策效应，也间接证明了采取差异化转移支付政策的重要性。

表 7 转移支付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地区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财政转移支付	0.0014 (0.0008)	0.0016 (0.0010)	0.0025*** (0.0009)	0.0003 (0.0011)
家庭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户主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7021	5997	8206	3268
R ²	0.0551	0.0978	0.0961	0.0576

注：①***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生计资本存在金融、物质、自然、人力、社会、心理六种形式，那么，财政转移支付对不同种类的生计资本的作用是否存在异质性？由表 8 可见，财政转移支付对生计韧性水平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物质资本与自然资本的积累上，即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住房、家具、电器、农业机械等耐用品和机械设备的消费以及对土地、水资源、清洁能源等的消费上，这些物质资本与自然资本的积累满足的通常是农户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此外，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也有一定促进作用，即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农户参与社会互动，构筑社会网络（例如邻里关系、与村干部的关系、社团组织关系等）。然而，财政转移支付对更高层次的生计资本（例如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心理资本）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部分生计资本的积累情况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例如，教育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但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另一方面，生计资本是包含多个维度的综合指标，例如，心理资本由主观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未来信心三个细分指标构成，财政转移支付对各个细分指标的作用可能不尽相同，因此，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在综合指标内部可能会相互抵消，从而使总效应不显著。

表 8 转移支付对不同生计资本积累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1) 金融资本	(2) 物质资本	(3) 自然资本	(4) 人力资本	(5) 社会资本	(6) 心理资本
财政转移支付	0.0000 (0.0000)	0.0156*** (0.0034)	0.0025*** (0.0009)	0.0000 (0.0002)	0.0020* (0.0011)	0.0007 (0.0007)
家庭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户主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24501	24349	24215	24501	24494	24443
R ²	0.3069	0.0556	0.0571	0.1320	0.0268	0.0861

注：①*和***分别表示 10%和 1%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根据传统可持续生计理论，金融、物质、自然、人力、社会五类生计资本的积累对提升生计韧性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心理成长是提升个体发展韧性的关键，心理资本积累有利于调动农户自我发展的积极性，提升自我发展动力。因而，心理资本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促进农村农民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表 8 的估计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心理资本积累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财政转移支付对心理资本这一指标内部各个维度细分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些影响相互抵消，从而使总效应不显著。因此，表 9 进一步研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心理资本各维度细分指标（包括主观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未来信心）的影响。表 9（1）列的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提升农户的主观社会地位，原因在于：财政转移支付是政府主动向特定群体提供支持的一种方式，有助于提升农户的获得感以及农户的被重视程度。此外，可以将主观社会地位视为个体对其社会资本的心理认知，根据表 8 的结果，财政转移支付对社会资本积累具有正向作用。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可以通过提高社会资本积累而提高农户对其主观社会地位的感知。表 9（2）

列和（3）列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无显著影响。未来，财政转移支付应继续以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为重要抓手。

表 9 转移支付对农户心理资本积累的作用

变量	(1)	(2)	(3)
	主观社会地位	生活满意度	未来信心
财政转移支付	0.0014*** (0.0004)	0.0006 (0.0005)	0.0002 (0.0005)
家庭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户主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24502	24502	24502
R ²	0.0735	0.0903	0.0346

注：①***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③主观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未来信心三个指标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以保障其与生计韧性构建过程中的计算方式一致。

五、机制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存在群体、时间和空间异质性。整体而言，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从而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那么，财政转移支付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农户各项生计资本积累的？本文从生计要素流动和生计策略多样性两个方面探讨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作用机制。

（一）生计要素流动

土地与劳动力是农户赖以生存的生计要素，推动土地流转、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解放低效农业劳动力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因此，本文选取土地转出、出租土地所得、非农就业三个指标分析财政转移支付如何通过生计要素流动影响农户生计韧性。

由表 10（1）列可知，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的土地转出行为存在正向影响。一方面，财政转移支付能够直接增加农户收入，纾解了困难群体的经济压力和农村老年群体的“照护”成本，为部分劳动力离开土地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土地承包与实际经营分离的农业补贴形式使得农户即使不经营土地也能获得部分补贴，在放弃外出打工、经营土地的机会成本较大时，农户倾向于转出土地。表 10（2）列表明，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出租土地所得存在正向影响。原因在于：农业补贴的获得与土地实际经营的分离提高了土地流转价格（杨青等，2022），即使在“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农村土地供给不足和农村土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存在使土地承包方依旧拥有较高的市场地位，土地流转价格的上升既能够促使农户转出土地，也可以提高农户的出租土地所得。农村土地与劳动力两种生计要素密不可分，由表 10（3）列可知，财政转移支付可以促进非农就业，即财政转移支付能够解放部分农业劳动力，使其参与非农就业。

表 10 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要素流动的影响

变量	(1)	(2)	(3)
	土地转出	出租土地所得	非农就业
财政转移支付	0.0028*** (0.0008)	0.0198*** (0.0057)	0.0052*** (0.0012)
家庭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户主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24504	24492	24488
R ²	0.0128	0.0133	0.0156

注：①***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 生计策略多样性

生计策略多样性使农户在一项生计策略遭受外部风险冲击时仍能抵御生计逆转，因此，多样性的生计策略有利于分散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从而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那么，财政转移支付是否能提升农户生计策略多样性？本文从总收入多样性、非农收入多样性、农业生计多样性角度度量农户生计策略多样性，相关估计结果如表 11 所示。可以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对总收入多样性、非农收入多样性和农业生计多样性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由以上分析可得，财政转移支付有助于农户非农就业，形成兼业型农户，从而增加农户总收入多样性。此外，这种总收入多样性来自非农收入多样性与农业生计多样性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财政转移支付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就业中农林牧渔业的多样性经营，另一方面能够促进农户在非农领域从事打工、个体工商业等多样性经营。农户总收入多样性、非农收入多样性、农业生计多样性打破了对单一生计形成依赖的不稳定性，提高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进而提高其生计韧性水平。

表 11 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策略多样性的影响

变量	(1)	(2)	(3)
	总收入多样性	非农收入多样性	农业生计多样性
财政转移支付	0.0054*** (0.0006)	0.0024*** (0.0006)	0.0244*** (0.0018)
家庭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户主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23039	21344	22671
R ²	0.0208	0.0585	0.0694

注：①***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家庭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为更加直观地说明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了涵盖财政转移支付、生计要素流动、生计策略多样性和生计韧性的结构方程模型^①，并估计相应的系数。如图 2 所示，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促进农户生计要素流动与生计策略多样性，而生计要素流动与生计策略多样性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生计要素流动与生计策略多样性是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重要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生计要素流动中的三个观测变量可以发现，土地转出与出租土地所得对潜变量（生计要素流动）的解释力较好。同理，总收入多样性和非农收入多样性对潜变量（生计策略多样性）的解释力较好。该结果与前述机制分析部分的结果基本一致，更好地验证了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韧性的作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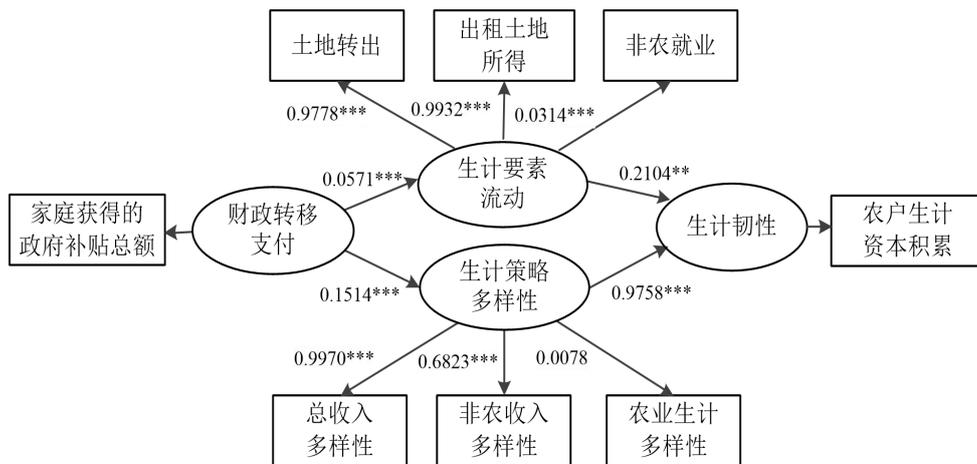


图 2 转移支付作用机制的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注：①为了保持整体美观度与可读性，图中省略了误差项。②***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

（三）对村级财政支出的进一步讨论

中国村级财政支出严重依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2014 年村级财政总收入中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占比达 50.17%，村级财政总支出中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占比达 66.84%^②。因此，村级财政支出总量及其配置模式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此外，从以上论证中可知，个体农户层面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假定财政收支无任何约束，则增加农户所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然而，村级财政收入的有限性使得一项财政支出的增加必然挤占另一项财政支出的份额。本文构建人均村级现金补助支出、人均村级民生性支出、人均村级生产性支出三个指标衡量村级财政支出配置模式，以进一步探讨村级财政支出配置模式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其中，人均村级现金补助支出=ln（村级财

^①结构方程模型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分析多个因变量的复杂模型和检验中介模型，在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领域研究中应用广泛，是微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②有必要说明，中国的财政体制中并未设立村一级财政，本文沿用 CFPS 调查问卷中的名称，文中的基层财政均指村级财政。该数据根据 2014 年 CFPS 村居数据计算得到，数据中仅保留了社区性质为村委会的样本。

政支出中直接发给村民的金额/村常住人口数），人均村级民生性支出= \ln （道路、水、电、煤气、上下水等公共服务支出与学校等教育投资支出总和/村常住人口数），人均村级生产性支出= \ln （农业水利等生产投资支出与集体经济投资支出总和/村常住人口数）。

由表 12（1）列可知，人均村级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利于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但不同财政支出项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根据表 12（2）列，直接发放给村民的现金补助对农户生计韧性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现金补助支出的增加挤占了民生性支出与生产性支出，而且村级支出中现金补助支出的惠及范围较小。（3）列显示，增加村级民生性支出能显著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民生性支出具有普惠性特征，有利于改善村庄整体的公共设施与服务水平，从而提高农户生计韧性水平。（4）列显示，村级生产性支出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也为正，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产生这一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村级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所占份额较小；另一方面，农田水利等生产性支出的受益范围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对外出打工、参与雇工或从事个体工商业经营的农户则作用有限。

表 12 村级财政支出配置模式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人均村级财政支出	0.0043***	0.0010						
人均村级现金补助支出			-0.0032**	0.0014				
人均村级民生性支出					0.0034***	0.0013		
人均村级生产性支出							0.0003	0.0012
家庭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户主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级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7735		14432		14468		14455	
R ²	0.2429		0.2538		0.2543		0.1546	

注：①**和***分别表示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家庭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③村级层面控制了村委会与集镇的距离、村农业劳动力比例、村人均耕地面积。

由于行政村自有财力薄弱，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高，本文构造了村级财政收支缺口、村级转移支付依赖（支出和收入两个角度）、村级自有财力四个指标，用以研究村级财政支出压力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其中，村级财政收支缺口= \ln （村级财政支出-村自有收入），村自有收入包括村民缴纳金额、村集体经济收入、土地房屋出租收入、土地征用收入；村级转移支付依赖（支出）= \ln （村转移支付收入/村级财政支出 $\times 100$ ）；村级转移支付依赖（收入）= \ln （村转移支付收入/村级财政收入 $\times 100$ ）；村级自有财力= \ln （村自有收入/村级财政总收入 $\times 100$ ）。如表 13（1）列所示，村级财政收支缺口对农户生计韧性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本文的村级财政收支缺口主要指村自有收入无法满足日常支出的缺

口,根据估计结果,这部分缺口越大,农户生计韧性的平均水平越低。表13(2)列和(3)列的结果显示,村级财政收支对转移支付收入的依赖不利于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这说明,开拓村级财源、降低转移支付依赖程度十分必要。(4)列显示,村自有收入占村级财政收入的比例越高,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越高,进一步验证了提升村组织自有财力的必要性。

表13 村组织财政收支压力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村级财政收支缺口	-0.0134***	0.0033						
村级转移支付依赖(支出)			-0.0022	0.0018				
村级转移支付依赖(收入)					-0.0034**	0.0018		
村级自有财力							0.0053***	0.0016
人均村级财政支出	0.0235***	0.0034	0.0109***	0.0015	0.0106***	0.0015	0.0107***	0.0015
家庭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户主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级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9997		11449		11449		11437	
R ²	0.1680		0.1592		0.1595		0.1604	

注:①**和***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家庭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③观测值数与基准回归相比减少的原因在于村级的财政收支数据存在较多缺失值和异常值。④村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同表12。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心理资本纳入生计可持续框架,测算了农户的生计韧性,基于测算结果研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此外,本文从生计要素流动和生计策略多样性两个方面探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作用机制。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结合中国村级财政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依赖性特征,从优化基层财政资金配置模式和缓解基层财政支出压力的角度探讨兼顾基层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

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存在群体异质性、空间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2014—2020年,农户生计韧性水平逐年提高,2018年及以后提升幅度较大。这说明,农村发展韧性稳中向好。然而,对低保户、中低收入群体、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等相对低收入群体而言,其生计韧性水平依旧较低,这些群体在遭受外部冲击时发生生计逆转的风险较高。第二,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韧性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具体而言,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物质资本与自然资本等满足基本生产生活需求的生计资本层面,对心理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主观社会地位的提升上。第三,财政转移支付能够促进农户转出土地和参与非农就业,提高农

户生计策略的多样性程度，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促进农业生计多样性（促使农户从事农林牧渔多样性经营）方面，还体现在促进非农收入多样性（促进农民外出打工、从事个体工商业等多样性非农经营活动）方面，从而分散单一生计来源可能带来的风险。第四，村级财政支出的增加可以显著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但不同的村级财政支出配置模式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民生性支出的受益范围广，对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提升作用非常明显，而现金补助等转移性支出则由于受益范围有限、挤占其他支出类型等问题的存在，反而会制约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提升。此外，提升村组织创造自有财力的能力、降低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缩小财政收支缺口均有利于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为使财政转移支付更好发挥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形成财政转移支付继续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中国的减贫实践表明，财政转移支付是见效速度快且效果显著的减贫措施，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现阶段农村发展的重心已转向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因此，需继续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在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保证财政转移支付金额总体稳定。同时，在关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在促进生产与生活等基本生计资本积累方面作用的基础上，应根据农户在教育、医疗、金融、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条件实施和完善各项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从而形成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各项生计资本积累、保障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二，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在农户生计活动中的正向激励效应，将财政转移支付尽可能纳入农户生产经营活动。虽然按人头进行现金补贴的转移支付形式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但“救济式”转移支付所具有的无偿性会使农户缺乏自我发展的激励，容易形成“养懒汉”现象。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应在促进低效农业劳动者非农就业、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农户兼业行为、提升农户多样性经营等方面发挥激励效应，在促进生计要素流动和生计策略多样性的同时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以应对生产生活中的各类外部风险与冲击。

第三，在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改革与创新的同时，要兼顾基层财政的可持续性。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治理主体之一，村级财政在农村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一方面，村级财政对上级部门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高；另一方面，现金补助等转移性支出的增加会挤占民生性支出，进而影响村级财政支出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中的积极作用。为使财政资金更好发挥提升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的作用，必须努力提高基层财政的可持续性。本文认为，提高基层财政的可持续性需“开源”“节流”两手抓。一方面，可以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兴办村集体企业等途径积极拓展村级财源；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优化村级财政资金配置模式，平衡现金补助支出、民生性支出与生产性支出等支出形式，最大限度发挥有限的财政资金在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发展和平稳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曹亚、陈浩, 2010: 《劳动力流迁就业、资本逆向输出与农地流转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第35-45页。
- 2.崔景华、李万甫、谢远涛, 2018: 《基层财政支出配置模式有利于农户脱贫吗——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财贸经济》第2期, 第21-35页。
- 3.范燕丽、丛树海、郗曼, 2021: 《从“争穷保帽”到“主动摘帽”: 正向激励与农民持续增收》, 《财政研究》第12期, 第63-78页。
- 4.范子英, 2020: 《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 《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第48-67页。
- 5.耿亚新、刘翔含、饶品祥, 2021: 《农户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及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林业经济》第5期, 第17-31页。
- 6.郭庆旺、陈志刚、温新新、吕冰洋, 2016: 《中国政府转移性支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世界经济》第8期, 第50-68页。
- 7.黄季焜、王晓兵、智华勇、黄珠容、Scott Rozelle, 2011: 《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业技术经济》第1期, 第4-12页。
- 8.冷博峰、李谷成、冯中朝, 2021: 《从不种地农民也能领取农业补贴谈起——兼论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后的补贴发放方式》, 《农业经济问题》第5期, 第54-65页。
- 9.李晗、陆迁, 2021: 《精准扶贫与贫困家庭复原力——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第28-41页。
- 10.李晗、陆迁, 2022: 《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与家庭发展韧性——来自中国低保政策的经验证据》, 《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第82-101页。
- 11.李志平、吴凡夫, 2020: 《继续增加财政转移性支出可以提高脱贫质量吗——基于生计抗逆力和CFPS数据的实证》, 《农业经济问题》第11期, 第65-76页。
- 12.刘伟、黎洁、李聪、李树茁, 2014: 《西部山区项目扶贫的农户收入效应——来自陕西安康的经验证据》,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第42-51页。
- 13.宋璐、李树茁, 2017: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家庭结构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人口研究》第3期, 第65-75页。
- 14.王军、朱杰、罗茜, 2021: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 第26-42页。
- 15.吴学兵、尚旭东、何蒲明, 2021: 《有偿抑或无偿: 政府补贴、农户分化与农地流转租金》, 《经济问题》第12期, 第59-66页。
- 16.解垚, 2017: 《公共转移支付对再分配及贫困的影响研究》, 《经济研究》第9期, 第103-116页。
- 17.解垚、李敏, 2022: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 《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第99-112页。
- 18.许庆、陆钰凤, 2018: 《非农就业、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农地流转》, 《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第30-41页。
- 19.杨青、彭超、许庆, 2022: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促进了农户土地流转吗?》, 《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第89-106页。

20. 易法敏, 2021: 《数字技能、生计抗逆力与农村可持续减贫》,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第1-13页。
21. 于肖楠、张建新, 2005: 《韧性(resilience)——在压力下复原和成长的心理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第5期, 第658-665页。
22. Berkes, F., and H. Ross, 2013, “Community Resilience: Towar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6(1): 5-20.
23. Brück, T., M. d’Errico, and R. Pietrelli, 2019, “The Effects of Violent Conflict on Household Resilience and Food Security: Evidence from the 2014 Gaza Conflict”, *World Development*, Vol. 119: 203-223.
24. Caminada, K., K. Goudswaard, and C. Wang, 2012, “Disentangl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Redistributive Effect of Taxes and Transfers in 20 LIS Countries over Time”, LIS Working Paper 581,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42350/1/MPPRA_paper_42350.pdf
25. Cissé, J. D., and C. B. Barrett, 2018, “Estimating Development Resilience: A Conditional Moments-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35: 272-284.
26. Dou, Y., P. Deadman, M. Berbés-Blázquez, and N. Vogt, 2020, “Pathways Out of Poverty Through the Lens of Development Resilience: An Agent-Based Simulation”, *Ecology and Society*, 25(4), <https://doi.org/10.5751/ES-11842-250403>.
27. Erenstein, O., J. Hellin, and P. Chandna, 2010, “Poverty Mapping Based on Livelihood Assets: Ameso-level Application in the Indo-Gangetic Plains, India”, *Applied Geography*, 30(1): 112-125.
28. Haushofer, J., and E. Fehr, 2014, “On the Psychology of Poverty”, *Science*, 344(6186): 862-867.
29. Johny, J., B. Wichmann, and B. M. Swallow, 2017, “Characterizing Social Networks and Their Effects on Income Diversification in Rural Kerala,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Vol. 94: 375-392.
30. Kim, K., and P. J. Lambert, 2009, “Redistributive Effect of U. S. Taxes and Public Transfers, 1994-2004”, *Public Finance Review*, 37(1): 3-26.
31. Li, E., Q. Deng, and Y. Zhou, 2022,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s out of Pover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Lankao County, Henan Province,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93: 210-222.
32. Lindert, K., E. Skoufias, and J. Shapiro, 2006, “Redistributing Income to the Poor and Rich: Public Transfer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h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37048,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534671468044934128/pdf/370480En0breve111Redistrib01PUBLIC1.pdf>
33. Parker, S. W., and T. Vogl, 2023, “Do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Improve Economic Outcome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Evidence from Mexico”, *The Economic Journal*, 133(655): 2775-2806.
34. Quandt, A., 2018, “Measur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The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Approach (HLRA)”, *World Development*, Vol. 107: 253-263.
35. Quandt, A., H. Neufeldt, and J. T. McCabe, 2019, “Build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What Role does Agroforestry Play?”,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11(6): 485-500.

36.Scoones, I., 1998,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DS Working Paper 7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Ian-Scoones/publication/251873585_Sustainable_Rural_Livelihoods_A_Framework_for_Analysis/links/5561c41808ae6f4dcc94f72b/Sustainable-Rural-Livelihoods-A-Framework-for-Analysis.pdf.

37.Thulstrup, A. W., 2015,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 Tracing Changes in Household Access to Capital and Central Vietnam”, *World Development*, Vol. 74: 352-362.

(作者单位：¹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²浙江财经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

³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马太超)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on Rural Livelihood Resilience: Promoting or Restraining

FAN Yanli CONG Shuhai

Abstract: The common prosperity for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is the difficulty and key point to achiev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and improving the rural livelihood resilience provides new ideas for achieving this goal smoothly. This study uses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set from 2014 to 2020 to construct a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icator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combing with psychological capital. Based on this indicator,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affecting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from two aspects: livelihood factor mobility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diver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livelihood resilience is heterogeneous in different entities, regions, and years. From 2014 to 2020,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but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low- and middle-income rural households, and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northeast and west regions was still low.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livelihood capital of rural households, but this accumulation is still limited by the subsistence capital which meets the basic production and living requirements of rural households, such as material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Livelihood factor mobility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diversity are two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affects livelihood resilience. However, the improvement of village cash subsidy expenditure restricts the improvement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due to the nature of limited grassroots financial funds and the different benefit scopes of different financial fund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constructing a long-term dynamic mechanism of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promoting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to play a positive incentive effect on rural livelihood activitie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re essential to achieve the common prosperity for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Livelihood Resilience; Common Prosperity; Livelihood Capital; Livelihood Strategy